

建好治港人才庫 為「愛國者治港」未雨綢繆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香港社會撥亂反正、重回正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邁向良政善治，把「一國兩制」辦得更好更成功。這就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這就是要解決一些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好的難題，民建聯提出「變革香港」，就是希望政

府以至社會各界都可以用新思維、新方法去應對老大難的舊問題，尋找突破點讓矛盾早日消弭；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培育更多政治和管治人才，為未來「愛國者治港」的隊伍建設作好準備。為此各界需共同出力，為香港建好治港人才庫，確保有一群有能力又有志於服務香港的精英，可以隨時進入政府。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為了讓香港有更多政治和管治人才，民建聯舉辦「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程，歡迎社會中對從政有興趣的年輕精英分子參加，並希望他們透過23堂課去掌握當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以及香港在國家大局中的角色。

香港需有一個治港人才庫

這23堂課當中有20堂是主題講課，分別由20位重量級嘉賓主講，包括內地及本港資深官員、學者和專家。相信各位學員完成課程後，對於在港從政會有更多的認識和深刻的思考。最重要是能令他們清楚了解新時代下的香港對於治港者有什麼要求，也讓他們知道參與治港途徑。

開學禮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要施

政暢順就需要大量有能力的治港人才，而選舉並非從政唯一出路，要在真正的行政主導中發揮管治效能，就要走入政府的「熱廚房」。她所指的應該就是正副副局長。這些職位在政府管治方面最為關鍵，是各個施政範疇的負責人。行政長官尚且要由選舉產生，但正副局長不能由選舉產生，而這些重要的官員如何產生就成了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過去，行政長官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忙於選舉工程，而候選人又不可以有政黨背景，當選後就要在短時間內組成新管治班子，霎時間未必可以找到合適的人選。因此，香港需要有一個治港人才庫，確保長期有一群有志於服務香港的精英預備好隨時進入政府。這個人庫當然不限於民建聯，社會各界都可以合力推動；但

民建聯定當大力支持，並透過開辦「政道」這類課程讓各位年輕精英有機會接觸到治港方面的信息。

治港人才要有政治意識廣闊視野

今時今日，治港人才必須接觸全面的資訊，特別要對國家歷史和中央治港方針有準確的了解和把握。過去的說法一直是「依法施政」，這個說法當然是對的，未來也將繼續這樣說，但一定要避免狹隘地去理解它的意義。如果用一種狹隘的角度去理解「依法施政」，就有可能變成因循守舊和官僚主義，而這正是良政善治必須避免的。「政道」課程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向未來有可能參與管治香港的精英介紹治港者應有的思想準

備。舉例說，金一南教授的講題是「讓愛國成爲一種信仰」，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會談「愛國者治港」，這些題目就針對治港者的政治倫理及個人修養，如何在「一國兩制」下端正思想，對愛國有正確的領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題目談到國情，「十四五」規劃、「雙循環」這類熱門題目都會觸及；也有一些課堂會談到內地和外國的例子，深圳、新加坡都會有專題探討。

由此可見，治港人才不只是一個執行指示的人，除了行政的本事，更重要的是他有政治意識和廣闊的視野，對國家、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有真實的了解。民建聯將盡自己的能力，幫助香港尋找和培育治港人才。

通訊局放生港台自相矛盾令人失望

林暉 時事評論員

去年港台英文節目《脈搏》(The Pulse)中，記者唐若韜追問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世衛成員資格，引起軒然大波，通訊事務管理局接獲210宗投訴，但該局日前裁定投訴理據不足，因此無須向港台採進一步行動。港台記者在該節目中的言行明顯有違「一個中國」原則，被訪者當時已對其問題置之不理，商經局當時也作出批評，然而通訊局竟然說投訴理據不足，但同時又指有關事宜不屬該局管轄範圍，是自打嘴巴。

對於該節目的錯誤，港台狡辯沒有違反《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但也坦誠節目表達和處理手法可能令人錯誤理解和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商經局更在去年就對節目提出批評，更點名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作為香港電台的總編輯，必須對此負責」。因此，通訊局竟然指對該節目的投訴不成立，令人摸不着頭腦。至於通訊局指該節目煽動他人對國家反感等投訴「不屬通訊局的管轄範圍」，更令人莫衷一是。如果市民的投訴超出該局權力範圍，該局也只能就此請示上級，而不能就此否定投訴的理據，否則豈不是越權判定該節目沒有煽動？令人感覺投訴者是錯誤的？

親乎市民的投訴，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違反《香港電台約章》。因為《約章》規定香港電台要讓市民認同公民身份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加強

市民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識，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的認識。而為台灣當局加入世衛張目的言行明顯違背「一個中國」，向社會傳達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這一點明眼人不難判斷投訴有理有據，且其性質嚴重，理應追究到底。

投訴的另一方面是內容偏頗和欠缺事實根據。身為記者，唐若韜應該具備正確的知識和立場，應該知道世衛「會員資格」是涉及主權國家的資格，中國一貫反對台灣以任何實體名義參與，但對於台灣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共同參與則表達開放與歡迎。2016年後，世衛組織不再允許台灣代表出席世衛大會，原因是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因此台灣參與國際會議的基礎不復存在。但唐若韜在節目中絕口不提相關背景，也絕口不提「一個中國」原則和世衛組織的規定，卻稱「中國大陸和世衛將台灣拒諸門外」，毫無事實根據，實在別有用心。

港台每年花費納稅人十億港元公帑，但製作出來的節目不僅收視率低，而且《頭條新聞》、《鏗鏘集》、《脈搏》等過往均劣跡斑斑，除了港台管理層需要深刻反思，有關政府部門也難辭其咎，應該思考徹底改革港台管治架構，讓港台回歸一個公營媒體應有的立場和作用。因此通訊局對市民的投訴不是深刻反思，而是選擇冷淡應對，着實令公眾失望。

歐盟玩弄政治把戲自暴其醜

江樂士

日前，由高宇馳(Thomas Gnocchi)領導的歐盟駐港辦事處展示了電子蠟燭圖，並在社交媒體發布燭光照片，明顯是要吸引眼球。由史墨客領導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也作出了同樣的舉動。本以為歐盟會恪守外交禮儀，但想不到它也會搞這些政治小把戲，最終被外交部斥之為「劣拙的政治戲碼」。

歐盟駐港機構表現得欠缺政治敏感度，它的虛偽也不是無跡可尋。例如在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在司法監督下，將逃犯遣返至內地以及其他與香港沒有簽訂移交機制的地區。歐盟當時公開抨擊這項條例，諷刺「中國立心不良」。歐盟的舉動反常，因為九個歐盟成員國早已各自和中國簽署引渡協議，而保加利亞、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曾成功把逃犯遣返中國，過程毫無問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歐盟卻試圖阻止香港建立相應的移交安排，實在是虛偽至極。

「燭光政策」意欲何在？

歐盟辦事處在Twitter發推文解釋燭光照片，還為自己無視中國民族感情之舉辯解，稱「歐盟在歐洲致力維護普世人權，並呼籲世界各國尊重這些人權」。既然如此，我們就拭目以待，看看歐盟是否在全球推行「燭光政策」，抑或只是存心要中國難堪而已。若是前者，歐盟點蠟燭的工作量將不小。

舉例說，2021年8月16日將會是「彼得盧屠殺」202周年紀念日。事件發生在1819年英國曼徹斯特，當日騎兵在步兵和砲兵的支援下，襲擊了約6萬名聚集在市中心要求推行議會代表制的平民，釀成18人死亡和400多人受傷。高宇馳如此信奉「普世人權」，他是否要提醒歐盟曼徹斯特辦事處在8月16日燃點燭光紀念，並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圖片呢？

政治偏見 顯而易見

今年6月1日為「塔爾薩大屠殺」100周年。1921年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的塔爾薩市，一群白人暴徒摧毀當地一個非裔美國人的小鎮，造成近300人死亡，800人受傷，超過1,250所房屋被破壞。看到高宇馳忽然對燃點蠟燭萌生興趣，筆者真的想知道，他自己搞政治小把戲之前，是否應建議歐盟駐華盛頓辦公室在6月1日燃點蠟燭，然後把圖片發布至社交媒體上呢？高宇馳在2020年才到香港履新，這是歐盟辦事處第一次作出帶有強烈政治偏見的舉動。他有否與史墨客一起策劃此事，我們不得而知，但種種跡象顯示有這種可能性。這一操作將使港人更清楚看透歐盟的伎倆，也凸顯英國民眾選擇脫歐的先見之明。作者在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本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有刪節。

「躺平」文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近日，關於「躺平」文化的話題在內地網絡引發熱議。其最初解釋為降低生活與消費慾望，以維持自在愜意；後來被引伸為以無慾無為來對抗社會上過度激烈又未必看得見回報的競爭，相關討論一度引起官媒關注。

筆者認為，「躺平」並非中國內地特有的現象，而是都市青年在表達生存困境的宣洩出口，與整個社會發展、經濟轉型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香港當局亦應重視，並為青年給予政策支援。

表達生存困境的焦慮

「躺平」文化屬好與壞並不是關鍵，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躺平」一說會引起那麼熾熱的討論。共鳴論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受眾的經歷中有相匹配的氛圍或環境，使之能與受眾真實或想像的經歷連接起來，從而產生認同感。當一個網絡熱詞變成一種社會現象，反映這現象已引起受眾共鳴。

回顧近年在內地城市走紅的網絡用詞：「996」、「內卷」、「佛系青年」、「喪世代」、「打工人」等，無不與社會競爭激烈、青年向上流動難等問題有關。當預視到再積極應對挑戰都無法改變生存現狀時，帶有焦慮與抵抗情緒的青年便有可能走向另一端：消極接受，衍生「躺平」認同感。

在為「躺平」文化「溯源」與分析的同時，香港亦應引以為鑑，以應對香港社會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青年向上流動難

香港政府統計處早前公布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顯示，1995至1999年出生、獲專上教育程度者達20至24歲時獲得的實質就業收入，平均

低於1970至1974年出生者。其中，接受大學教育者的收入下跌了7.2%，具研究院教育程度者收入更與25年前具學士課程教育程度者收入處於相同水平。數字反映了一個結構性問題：香港青年即使提升學歷也難以向上流動、改善生活條件。

近十年，香港青年的「三業」問題始終備受困擾，即學業、事業、置業。樓價長期高企、物價持續上漲、社會貧富懸殊、政治紛爭不斷、資源權力分配不公等問題，進一步加劇青年的焦慮與擔憂等負面情緒。

全球一體化後，香港年輕人面對的不僅僅是本地競爭對手，更是來自內地、周邊地區甚至全球的競爭對手。導致社會流動停滯的原因有很多，部分如財富分配不均、高等教育普及化、M型社會等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大趨勢，很難在短時間內單憑香港本地政策可處理。但也有一些可改變的因素，如年輕人自身抗逆能力弱、心態與視野格局有待改善等。

因此，當局政策需着力於提高新一代青年的綜合競爭力、創新破格思維及創造力、強化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建設等，並要在公共政策上給予變革性的扶持，讓年輕人知道政府理解並正在幫助他們。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上一代甚或再上一代那種只要努力就有正比回報的年代已難以複製，但「佛系」地放任青年收入每況愈下卻無法改變，亦難以推動社會健康往前發展。

有一種效應叫「登門檻效應」，指只要一級一級台階登門檻，會更容易登上高處。解決青年問題實屬不易，但再高的樓，也有通往高層的階梯。或許，無慾無為的「躺平」並非青年原意，若青年能看到逐步向上流動的「階梯」與政策實施時，「躺平」的青年也會願意坐起來、站起來、跟隨社會的步伐走起來、跑起來，一步一步往夢想出發。



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強化普通話教育 滿足香港發展所需

國家教育部早前發表《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提出粵港澳三地還需進一步做好語言政策規劃。中國人口十四億之多，世界華人社會，以普通話作溝通的，不計其數，而港人與內地人聯繫語言亦是普通話，所以普通話教學是香港特區長遠教育規劃及進深的重要一環。

港英時代語文教學政策重英輕中、尊崇英語，原因十分簡單，英語的超然地位向莘莘學子傳遞西方的意識形態，削弱中華民族意識，即使在職場上也很多時以英語能力劃分階級，鞏固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地位，同時配合當時全球化英語霸權的體系，以英語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變得理所當然。

基礎已定 應要盡快落地實施

回歸以來，政府嘗試改變語文政策主要方向，當中包括1999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文件中提及，香港作為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機，保持優勢，需要以「普通話教育為遠程目標」，確保香港人的兩文三語能力。直至2008年，為政府提供語文教育建議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正式設立「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計劃」。

然而，「英文中學」的精英形象根深蒂固，加上近年政治形勢有變，令普通話教學難以有效實行。的確，香港未來教學語言政策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去殖民」。若想在世界立足，就必須首先學會如何與內地和世界溝通，因此，當英語還是世界「通用語」，

就少有反對「學好英語」的說法。時至今日，中國發展一日千里，香港的家長不會對全球發展視而不見，他們都清楚明白普通話的重要性，正好解釋普通話補習生意早已興旺的現象。

當然，社會上仍然有部分聲音反對普通話教學，指用廣東話作教學語言更有利學生學習。此等說法是欠缺對語文教育的理解。事實上，無論推行任何語文政策，學校必須考慮學生本身的語文能力，若全港學校強制推行一式一樣的政策，必定會有學生「吃不消」，以致影響學習。以英語教學為例，香港的學校想要成為香港家長趨之若鶩的「英文中學」的話，就必須證明學生符合相關成績要求，普通話教育也不例外。要有效推行，必須先了解學生的能力，配合師資，因材施教，以提供到位和足夠資源，才算得上是有效學習。

不少擁有豐富資源的學校明白普通話的重要性，不惜以高薪每班額外聘請多一名以普通話作母語的助教老師，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課程，道理就好像以英語作母語的英文老師(NET - Native English Teachers)一樣。雖然政府難以為每間津貼學校每班分配多一名具以上背景的教師，但到位的資源分配對學校推行政策確實十分重要。除了專業的語言教學研究基礎，政府也應提供足夠的專業支援予有需要的學校，如開普通話專職教席、給予更多財政支援等，以學生的學習為依歸。只要能提升教學質素，學校便有誘因推行普通話教學，家長也必定支持。

